



1944年，大学生在阅览室读书。

□纪习尚

今年，1291万学子参加高考，预计将有1000万人以上能圆大学梦。而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，经济落后、战乱频仍，只有少数青年有机会读大学。比如1937年，国立山东大学报考人数2000余人，只有196人被录取；1940年，全国公立高等院校录取的总人数仅为18151人，加上私立大学，也不过几万人。同时，那个时代也有填报高考志愿的指南书，如1937年的《升学指南》就介绍了二十多所大学的详细情况，包括所设学科、毕业年限、学费等。

笔者翻阅史料了解到，上世纪30年代各大学是独立命题招生，一到招考季，考生要乘船、乘车，甚至步行奔波于多个城市。举例来说，一个考生从济南到北京投考大学，需要来回路费、一周左右的住宿费、伙食费等费用。1934年，一张从济南到北京的三等火车票，价格8.9元，是普通人一个多月的伙食费；考试费又需要2元，再加上住宿、吃饭，一场考试下来要30元左右，相当于当时工薪阶层一个月的收入。

1935年，来自僻远乡村的学生张镜子，在《东方杂志》上讲述了自己投考大学的曲折经过。他的家乡，是一个不足二百人的小村庄，世代代以耕作为生，他是村里的第一个读书人。读到中学后，家族就不支持他继续读书了，认为安安稳稳地守住祖先的田地才是正业。张镜子虽然理解长辈的苦心，但无法扑灭梦想的火苗。为了能够节省一个学期的学费，他决定报考大学插班生，直接进入大学一年级学习。那年春节，张镜子就开始留意报纸上的招生广告。当看到一所大学招收插班生时，他背起行李，一个人前往上海报考。当时交通落后，他一路辗转到达学校时，发现考试已经结束好几天了。张镜子最后找到教务主任，陈述了赶考的经过，才被准予补试。

1937年印行的《升学指南》，是一本填报高考志愿的指南书。书中介绍了二十多所大学的详细情况，包括所设学科、毕业年限、学费等。以国立山东大学为例，学费16元、住宿费10元、膳费60元、书籍文具费50元、体育费4元、其他费用54元，再加上一次性交纳的预存赔偿费10元、制服费20元等，每年至少需要200元。另外一所国立大学交通大学，新生入学时，需要交纳学费、住宿费、膳费71.3元，此外还要交存储费10元、图书馆费10元、体育馆费15元、服装费35元等，



1936年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职员合影

和国立山东大学的费用差不多。

读私立大学的花费要高一些，比如私立齐鲁大学，1937年文、理、医三科的学费分别是35、40、50元，比国立山东大学高了一倍以上。其他费用如果按照公立大学的标准计算，私立大学一年约需240元以上。我们可能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，和当时的收入做下比较就清楚了。1935年，青岛市私立小学教职员工的月薪在30元左右，年收入在360元左右。这样一个在当时属于中等的家庭，培养一个大学生，就需要花去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，为数更多的农民和普通市民，其负担更是可想而知。

很多人为了读大学想尽了办法。1935年，刚毕业的大学生赵竹光回忆了自己读大学的艰辛。中学毕业后，他的家庭要求他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结婚。赵竹光不想这么年轻就放弃学业，于是含泪恳求退婚，但长辈不允。无奈，赵竹光离家出走，好不容易从朋友处借到了300元。他靠这笔钱，考入了上海的沪江大学，并撑过了第一年；第二年，赵竹光的叔叔给他寄来一些钱，他又通过勤工俭学不时贴补，艰难度过；第三、四年，头脑灵活又勤奋肯干的赵竹光依靠自己的所学，为商务印书馆著译文章。学习之余，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时，出版了两本书，凭借版税完成了大学学业。大学四年，他经常只能靠大饼度日，而没有任何菜蔬；兜里连乘坐电车的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也是常事。

1945年以后，国内物价飞涨，大学费用也水涨船高。1947年，中国青年互助会编印了《升学指导丛书》，其中的第一册是《最近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概况一览》。这本书厚达299页，分为甲、乙两部分。甲篇介绍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农、商、医、师范八个主要学科的学习内容、所含专业、报考时的注意事项等。乙篇介绍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、国、省、私立独立学院、国、省、私立专科学校等八类，共二百余所高校的详细信息，供考生填报志愿之用。1947年的下半年，国立山东大学的学费涨到了5000元，体育费为10000元，杂费为50000元。费用上涨，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一同增加，普通人读大学更难了。

1945年出版的《时代学生》杂志里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复旦大学一位笔名叫佐若尼的新生，原本是小学教员，家境清贫，身无分文。入学后，第一学期1500元的学费就让他犯了难，借贷无门的他只能求助自己的姐姐，姐姐叹息着说：“唉，这样的家境，怎能念书？”但骨肉情深，最后还是东拼西凑把学费交到了弟弟的手里。没想到第二学期，学费突然涨到了7000元，佐若尼虽然申请到了3000元的清寒学生助学金，但剩下的4000元还是要再次求助姐姐。佐若尼感叹说：“这四年的大学过程不知将如何度过，我知道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，一定不少。”

另一个名叫陈伟的学生，因为家境困难，不得不半工半读。他上午在一所大学里读土木工程；下了课，就要搭乘电车，到一家商号噼里啪啦打算盘处理财务；到了深夜，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，很少有时间温习功课。

□刘永加

诫子书作为古代家训的一种形式，浓缩了古代文人学士毕业生的生活经历、人生体验和处世做人智慧，劝诫自己的子女修身养性、治学做人、建功立业。

郑玄(127-200)，东汉末年北海郡高密县(今山东高密市)人，他一生淡泊名利，曾推辞大司农的征拜，痴心于学术，创立了集经学之大成的郑学。郑玄只有一个儿子，叫郑益恩，曾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，后来袁绍之子袁谭率军攻打北海，把孔融包围在都昌(今山东昌邑)，情势危急，郑益恩率家兵前去营救，结果反被围杀，年仅27岁。

在这次事件之前，已经七十岁的郑玄正身染重病，估计自己不久于人世，他在用心写下的《诫子益恩书》中写道：“吾家旧贫，不为父母昆弟所容。去厮役之吏，游学周、秦之都，往来幽、并、兖、豫之城，获覲乎在位通人、处逸大儒，得意者咸从捧手，有所受焉。遂博稽六艺，粗览传记，时睹秘书书术之奥。年过四十，乃归供养。假田播植，以娱朝夕……”与其他的诫子书不同的是，郑玄和盘托出自己一生的求学经历和人生志向，以现身说法的方式，含蓄地向儿子传授治学、为人的宝贵经验。信中他对儿子在道德和生活方面提出了要求，要求儿子“勤求君子之道，研钻勿替，敬慎威仪，以近有德”，希望儿子遵循君子之道，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，最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。因为郑玄一生崇尚节俭，并身体力行，所以他要求儿子“勤力务时，无恤饥寒。菲饮食，薄衣服”，这是教育儿子不仅要注重勤劳，更要在吃穿上节俭。他还希望儿子能够继承父业，继续学术研究。

徐勉(466-535)，南朝梁时东海郡郟县(今山东省郟城县)人，因治理朝政有方，被称为贤相。徐勉一生虽然身居高位，但他清正廉洁，办事公正，严于律己。他的大部分俸禄都用于救济贫困的亲朋好友，家里没有任何积蓄。曾经有好友劝他多为子孙后代留点钱，为他们置办一些产业。可徐勉却说，能够给子孙留下清白，比给他们留下财产更重要。如果子孙有才能、有德行，他们自己也会创下家业，并不需要给他们留下什么。如果子孙不能够成才，那么，即使给他们留下的是金山银山，也不够败坏的。垂暮之年，徐勉郑重其事地给

长子徐崧写了一篇《诫子书》：“吾家世清廉，故常居贫素，至於产业之事，所未尝言，非直不经营而已。薄躬遭逢，遂至今日，尊官厚禄，可谓备之。每念叨窃若斯，岂由才致？仰藉先代风范，及以福庆，故臻此耳。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，不亦厚乎？”他告诫儿子，要把清白的名声留给自己的子孙。徐勉还告诫徐崧，但凡做长兄的，都非常不容易。为人事务要使内外协调一致，别人无闲话可说。一事当前，先考虑别人，然后才是自己，这样才会受到尊重。在徐勉的教育下，他的子女后来都成了远近闻名的贤德之士。

邵雍(1012-1077)，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、教育家，与张载、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并称北宋“五子”。邵雍45岁时才有了儿子邵伯温，自然十分重视发挥父亲的教育责任。他专门写了诫子书给邵伯温：“上品之人，不教而善；中品之人，教而后善；下品之人，教亦不善。教而后善，非圣而何？教而后善，非贤而何？教亦不善，非愚而何……”邵雍强调人是分品位的：上等品位的人，不用教授就懂得善恶；中等品位的人，需要老师教授之后，才知道善恶；下等品位的人，即便老师教授了，也不知道善恶。所以，邵雍要求儿子恪守“交益友，不交损友”和“非善不交”的信条。邵雍一贯坚持“是知善也者，吉之谓也；不善也者，凶之谓也”。意思是，知善行善的人，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吉祥；而那些不善的人，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凶祸。所以他告诫子孙，一定要努力成为上品的善人，而不要沦为下品的愚昧人。尤其要守规矩讲道德，必须做到“目不观非礼之色，耳不听非礼之声，口不道非礼之言，足不践非礼之地”。邵雍常教导儿子要多干实事，少说空话，养成良好好习惯，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水平。

在邵雍的教导下，邵伯温学识才干超群，学术著作等身，所著《河南集》《闻见录》《皇极系述》《辩诬》《辩惑》《皇极经世序》等影响很大。同时，邵伯温坚持操守，维护道德，不与朋党和宦官为伍。南宋名相赵鼎年轻时就曾跟从邵伯温学习，他为邵伯温写的墓志铭就说：“以学识行起于元祐年间，以名节居处于绍圣年间，以言论受贬于崇宁年间。”邵伯温最终以学行、名节扬名天下，这与邵雍的教导是分不开的。

【读史所得】

饱含在诫子书中的父爱

【短史记】

八十多年前，读大学要花多少钱